

台湾嘉义市诸罗城墙兴建的变迁与再现研究

张志源

(台湾营建署)

摘要 本文以台湾嘉义市诸罗城墙的个案进行研究,讨论清代诸罗城墙兴建、修建,日治时期拆除及21世纪初诸罗城墙空间再现历程的分析。采用历史研究法及田野调查。研究发现:①诸罗城城墙兴建、修建、拆除到再现是和当时政治思维及社会目的有关,是“地方空间政治思维”演变的历程。②日本人拆除城墙与21世纪初嘉义市政府对“消失城墙”如何再现的过程,其空间提案与策略,是地方政府在当代文化资产保存思维上,以西方后现代主义象征再现的手法去创造出异质空间,带有虚幻的想象及形式重现的虚幻真实。③在丰富城市历史保存方式上,对于已完全消失的城墙,空间再现是一种手法,而嘉义城墙空间变迁的意义与象征间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

关键词 嘉义市 再现诸罗城 城墙 博物馆化 空间政治

本研究以台湾嘉义市诸罗城墙作为个案,讨论清代诸罗城兴建、修建,到日治时期嘉义市现代化过程对诸罗城拆除及21世纪初嘉义市政府对已拆除的诸罗城墙进行“空间再现”的过程,焦点集中在此历史空间变迁过程下的意义与象征。

一、文献回顾

关于清代诸罗城墙的兴建与修建,原始文献见于清代地方志书,主要包括《诸罗县志》、《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续修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台湾府舆图纂要》等。日治时期诸罗城墙拆除过程见于《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台湾日日新报》、《嘉义厅报》等记载。

对此课题的研究上,石万寿(1989)以历史研究观点,对清代诸罗城城墙进行推估及位置考证;蔡俊尧(2004)引用《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及《嘉义地方震灾志》资料进行城墙的讨论,提到诸罗城墙在日治初期及公元1906年大地震时城墙倒塌的状况;萧百兴(2008)分析诸罗城演变的空间象征意涵。21世纪初诸罗城再现的讨论来自邱上嘉(2004)对台湾嘉义市政府所提的“再现诸罗城”城乡风貌计划的讨论。本研究以上述讨论为基础,分析诸罗城墙兴建、拆除、再现的意义与象征。

二、研究方法

采用历史研究法及田野调查法,历史研究法主要透过诸罗城墙相关历史文献、档案、文件、遗物、事件,重建过去历史事件。资料收集部分包括嘉义市空间变迁、城墙兴建、修建、拆除的描述及对“再现诸罗城”的讨论。

田野调查法就诸罗城墙位置进行现况调查。

三、研究过程与成果

(一) 诸罗城城墙兴建到修建历程之意义与象征

1. 兴建阶段

诸罗城筑城分成四个时期:木栅城时期、荊竹城时期、土城外种荊竹、三合土城。

(1) 木栅城时期:城墙周围 680 丈,环以木栅,设东、西、南、北四门,虽为简陋木栅城,但为一府三县中最早建筑之城(周钟瑄,1962:25)。

(2) 荊竹城时期:因木栅城维护不易,修补花费甚巨。康熙 56 年(1717),知县周钟瑄于木栅外围加植荊竹,成为台湾第一座荊竹城(周钟瑄,1962:25)。

(3) 土城外种荊竹: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事件后,暴露出诸罗城荊竹城防御不当的问题。雍正三年(1725)开始,由台湾知县周钟瑄主持,知府孙鲁协助,执行建筑土城事宜。雍正十三年(1735),知县陆鹤于诸罗城土城外环植荊竹(和珅等奉敕撰,1969),但陆鹤筑荊竹成效不及周钟瑄所筑,到乾隆中已渐废堕,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三十九年(1774)海防同知朱景英,以“诸罗往时筑土为垣,岁久渐陟,令周大本增筑之。”(朱景英,1958:49)此次所筑之土城,较原木栅城增加 64 丈至 115 丈间。城内所围区域亦较木栅城大,扩大西、北两城墙范围。雍正五年(1727),知县刘良璧开始增建砖石门楼,并为四城门赐以嘉名,东曰“襟山”、西曰“带海”、南曰“崇阳”、北曰“拱辰”(刘良璧,1961:76-77)。

(4) 三合土城: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诸罗城在此过程中一直遭受林爽文军队的攻击,诸罗城内组织义民,协助官兵奋勇守城,方击退林军。乾隆五十二年(1788)11月3日,乾隆皇帝下谕诸罗城易名为“嘉义县”。诸罗城经林爽文之乱后,突显台湾城池防御的缺点,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改筑三合土城。陕甘总督福康安、福建巡抚徐嗣曾、工部侍郎德成三人共同商议嘉义建城事宜,在原土城位置上,按照原土城规制改筑,加高城墙高度,添加城楼、卷台等。

2. 修建阶段

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嘉义县城(原诸罗城)城垣大整修,增筑四城门外的月城、利用砖石修补城垣、增建炮台四座及疏浚城外壕沟,此次重建嘉义县城,一直到道光十三年(1833),历经 50 年,在这段期间,经震灾、风灾及战祸,城垣多处受损崩坏,不断进行修补。然因旧城壁粘结度不佳,容易脱落。

道光十二年(1832),张丙攻城(周凯,1960:123),闽浙总督程祖洛提出整修嘉义县城的提议,由告老的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以其子王朝纶的名义,率王源惠、刘高山等绅商铺户捐

款重修嘉义县城(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111)。

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城垣大整修,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竣工,于三合土外缘加砌砖石,增建炮台及门外月城。此次主要用在增筑砖石壁厚度及四城门外月城。

但重修后不过3年时间,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十七日,嘉义地区发生大地震,县城遭遇严重损害,东门、西门、北门等月城楼崩坏,窝铺、堤房均倒塌,城墙坍坏六丈有余,城垣上的墙垛也倒塌了981垛。

同治元年(1862),嘉义城遭戴潮春围攻,戴潮春带兵攻入嘉义县城内劫掠,城中百姓连夜运木石填塞城墙裂缝处,守兵凭借城内炮台之利据守,使其无法顺利攻入城中。同年五月十一日,发生大地震,嘉义城墙坍坏数丈,西门外土墙坍塌,但此二次地震中,均未作大规模补修,仅对城墙坍坏处作局部修补。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包容与士绅林启东等人发起整修嘉义城,于城外增筑蒺藜竹,为最后一次整修。

3. 象征与意义

诸罗城城墙兴建到修建的过程,背后是清帝国治理台湾城市发展过程的缩影,可见到的是怕民聚城为乱难攻到防城外的乱民入城。清代是台湾移民由台南一带向北开发的重要阶段,诸罗城的兴筑过程中,城墙地点设置扮演重要的角色,兴筑的过程是民间社会发展与清帝国制度建立间相互牵扯的过程,反映了清帝国对台湾此边陲之地的政治与空间策略。

康熙四十年以降,随着渡海来台移民及由南往北拓垦的现实状况,“诸罗县”境内呈现了南北差异的结果。在当时社会冲突下的重大民变,诸罗城在皇权谕示下落实,以政军为主的本栅城在此兴建,透过整顿与宣示的举动,扮演着皇权由南向北进行监控的角色。

诸罗城的修建与地震及战祸有极大关系。然而在乾隆皇帝赐名诸罗城为“嘉义县城”之时,皇权透过命名仪式收纳诸罗县的民力,产生“城防”的论述,破除了所谓“台湾断不可筑城”的思维,促成三合土城“坚固实用”的兴建。

道光以降,地方企盼已久的砖石之城在民间捐输下完成,此时在时代发展下,潜藏的却是嘉义县城已失去作为区域性监控中心的地位。

(二) 诸罗城城墙拆除历程之意义与象征

1. 第一波:交通与公共建设材料使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割让日本,日人挥军攻嘉义城,从东门突围入城,遭受城内居民抵抗,埋以火药爆破方式袭击,东门城上楼阁被破坏(许佩贤译,1995:42),之后,嘉义城还是沦陷。明治三十四年(1901)第一任嘉义厅长冈田信兴就任嘉义厅长后,面临财政困难下,拆除取毁嘉义城墙,作为公共建设的材料。

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二十九日厅长冈田信兴具文禀报台湾总督府^①,以东门城外城壁(月城)所在位置邻近新建的嘉义模范制纸工场,基于工场通往中莆、后大埔原料产地输送用的要道及有轻便铁道在此交会,并认为当时城垣本身壁面龟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交通上亦危险,所以为了交通安全考量及拓宽道路的缘故,申报计画拆除城壁31间(1间等于1.818米),之后,总督府方面核可了申请,并附记要求嘉义厅将东门城外城壁于取毁工程所

^①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取毁及同石材并炼瓦使用认可(嘉义厅)》。

拆除剩下的石材砖块等物料另纸再呈报。嘉义厅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二月十日覆文台湾总督府城墙拆毁的情形,并再度报请将拆除下来的砖石废材移作嘉义市道路及下水道等公共建设的使用^①。总督儿玉源太郎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月十六日批可此文案。

2. 第二波:嘉义城内外公共道路整修及下水道工事

经过此次顺利申请后,嘉义厅长冈田信兴与陆军幕僚参谋长及嘉义守备步兵第五大队长协议并取得认可后,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五月二十日再度提出第二波取毁的要求^②,此波拆除的范围包括嘉义城北门、西门之外门壁(月城的墙壁)及西门至嘉义停车场之间的城壁及东门侧壁城垣的一部分,预备将这些物材继续用于嘉义城内外公共道路整修及下水道工地上。

但嘉义旧城取毁的申请范围,因下水道设计缩短的缘故,从原订规划延长取毁城壁共计390间,改为实际拆除城垣长度270间^③,虽减少取用长度120间,但比前次拆除范围超出许多。当时台湾总督府为顾及地方的感受,飭令嘉义厅必须针对城壁每拆卸一间所取下的材料总数、拆除费用、城壁的断面图、红砖一枚的单价、所有红砖的总价、卵石一立方米的单价及所有卵石的总价、石材一才的单价及所有石材的总价、公共道路及下水道的设计书及1/600~1/2400实测图面添付报告、材料使用设计书与道路下水共断面图添付说明、城壁存置的必要性以及城壁取毁后对于地方的防御维安有无构成危险、城壁取毁对民心的影响评估,上覆总督府稟件^④。虽经过多次搁置,但最后在嘉义厅极力争取下,台湾总督府终于答应^⑤。

3. 第三波:军方营建材料使用

当时全台湾各地公家机关与政府部门均为缺乏公共建设的施工物料而头痛不已,军方也面临此相同问题。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二月二十六日,接获台湾总督府民政局民总第7046号“陆军永久兵营建筑材料”之训令,着手展开相关筹备事宜,并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一月七日回复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规划出嘉义旧城西门经“濠门”至东门一段,长度564间(约1025.35公尺),提供作为兵营建筑材料使用,并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三十日完成交付保管转换的手续^⑥。

4. 第四波:大地震后因应市区改正拆除需要

明治三十八年(1905)二月十五日,第四度取毁,主要因为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六日嘉义发生地震,使嘉义北门、西门、南门等城门上楼阁及周围炼瓦塼砖墙遭受很大破坏,当时军方却无立即展开拆除取毁,可能因工程上及人力的问题。

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三月十七日大地震及多次余震后,嘉义市家屋灾情不断扩大,加速推动市区改正计划的急迫性,使旧城纹里的“消除工程”成为嘉义厅首要任务。当时将北

①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取毁及同石材并炼瓦使用认可(嘉义厅)》。

②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③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④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⑤ 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第11卷,《嘉义城壁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⑥ 1912,《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追加),第4卷,《城壁陆军经理部一保管转换(宜兰外三厅)》。

门、西门、南门等城门上的楼阁予以清除,并打穿取扩大预定兴建中央圆环水池、中山路所需的城壁迹作为敷地,但当时并未开始进行大规模拆除工程。可从明治四十一年(1908)“嘉义街道路沟渠等废止报告”数据中看到已取毁拆除的城壁迹空地约为 0.0482 甲^①。此段取毁作业直至明治四十四年(1911)配合下水道兴建工程进度,城墙陆续开始拆除作业,至大正元年(1912)七月方完成转换工作^②。至昭和五年(1930)一月二十日嘉义街升格为市时,城墙已拆除殆尽,未留残迹。

5. 象征意义

日本人拆除诸罗城墙四波过程在象征上是破除旧有清代诸罗城纹理。因时代的进步,城墙已失去防御功能。然而日本人对于清代建造的诸罗城,除实质的取毁考量上,隐藏对原象征意象上的消除。利用加速推动市区改正计划的急迫性,使旧城纹里的“消除工程”成为嘉义厅首要任务。但一开始并未进行大规模拆除工程。而是慢慢将旧有城墙材料以新的建设工程的替代材料加以去除。至大正初年,配合地方怀柔政策,方由大规模的市区改正计划将城墙的意义予以去除。

(三) 诸罗城再现历程代表之意义与象征

1. 再现过程

21 世纪初嘉义市政府提出建构嘉义市为“艺术之都、花园城市”的都市愿景方向,以作为嘉义市在台湾城市竞争下空间发展的策略,提出诸罗新风貌的三大轴带:“文化景观带”、“市中心观光轴带”及“蓝绿带”(邱上嘉,2004:15)。其中“文化景观带”设计是形塑嘉义市特有的都市意象的重要方向,故将旧有清代诸罗城的思维提出“再现诸罗城”计划,于清代诸罗城旧城门六处遗址上,经由地貌改善、城墙与城门遗迹的复原仿真,期望建立市民对地方的认同感。策略上的思维主要是思考 21 世纪诸罗城“消失的城墙”如何再现的过程,其空间的提案上,是表现出嘉义市政府在文化资产保存上的现代性思维。而作为丰富城市历史保存方式上,“空间的再现”是一种重要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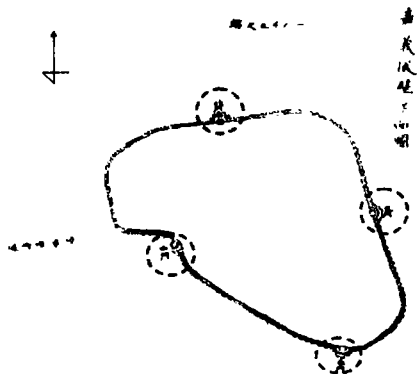
2. 象征意义

“再现诸罗城”计划思维是一种地方政府在 21 世纪台湾社会中空间治理与策略的手段,其背后是一种西方文化“博物馆化”的保存思维。是试图用空间形式表现反应出对诸罗城墙历史的“尊重”及试图振兴地方经济,而背后代表着今日嘉义市政府作为既有空间资产“承继者”的隐性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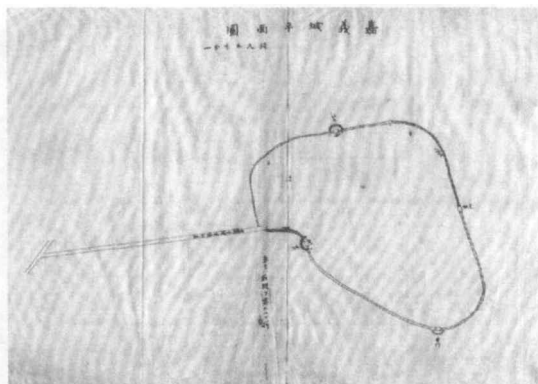
然后实质上今日“诸罗城墙”只是成为清代地点空间之名词,21 世纪提出“再现诸罗城”计划,面对的是只剩东门城门的圆环,其他城墙、城门遗迹皆已不见。此种再现的方式是以西方后现代主义象征再现的思维去创造出异质空间,带有虚幻的想象及形式重现的虚幻真实。

① 1908,《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 年保存,第 11 卷,《嘉义街道路沟渠等废止报告》。

② 1912,《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4 卷,《城壁陆军经理部—保管转换(宜兰外三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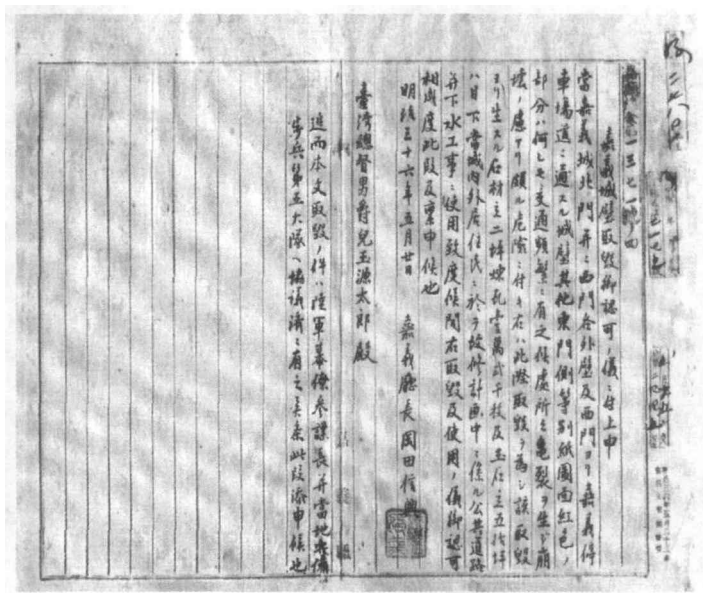
附图3 日人绘制的嘉义城墙平面图



附图4 日治初期嘉义城墙平面图

[资料来源:1912,《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追加),第4卷,城堡陆军经理部一保管转换(宜兰外三厅)]

(自城内延伸一条道路至嘉义火车站。[资料来源: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保存,第11卷,嘉义城堡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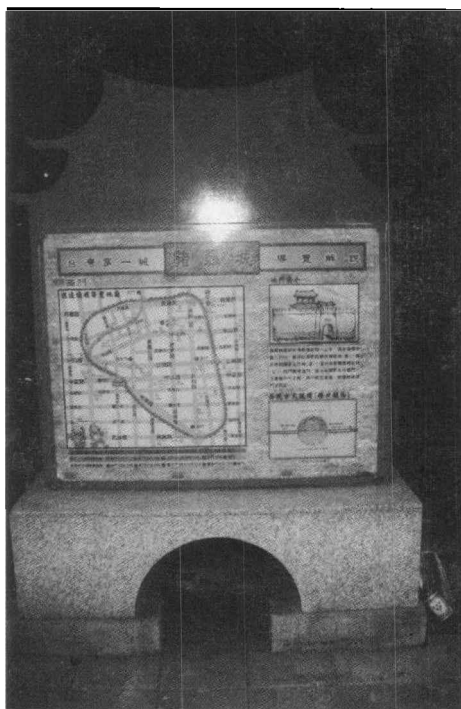


附图5 嘉义城堡取毁认可

[资料来源:1903,《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15年追加保存,第11卷,嘉义城堡一部取毁认可(嘉义厅)]



附图 6 再现诸罗城的形式
(资料来源:自行拍摄)



附图 7 再现诸罗城位置的标示
(资料来源:自行拍摄)

附表 诸罗城墙演变历程表

年代	公元	重要事件
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奉文归治,文武官员移驻诸罗山,并开始筑木栅城,定县治范围。当时城墙周围 680 丈,环以木栅,设东、西、南、北四门,虽为简陋木栅城,为一府三县中最早建筑之城
康熙五十六年	1717	知县周钟瑄于木栅外围加植蒺竹,使诸罗城成为台湾第一座竹城
康熙六十年	1721	朱一贵部将赖池攻陷南门城栅,北路营参将罗万仓阵亡。同年,朱一贵被俘于沟尾庄,事定
雍正元年	1723	知县孙鲁改筑土城
雍正五年	1727	知县刘良璧建砖石门楼及砖砌水涵,为四城门赐以嘉名,东曰“襟山”、西曰“带海”、南曰“崇阳”、北曰“拱辰”
雍正十三年	1735	知县陆鹤于土城外环植蒺竹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知县周大本重修土垣及蒺竹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皇帝下谕改诸罗县为嘉义县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清廷发帑改筑三合土城,由知县单去非、单瑞龙主理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三合土城完工
道光十二年	1832	张丙之役后,因震灾多处坍塌

续表

年代	公元	重要事件
道光十三年	1833	城垣大整修,邑令单瑞龙与水师提督王得禄合力劝捐修筑为砖石城,于三合土外缘加砌砖石及增建炮台及门外月城
道光十九年	1839	五月地震,东、西、北三个城门及城垣等坍塌
同治年间	1860	知县包容与士绅林启东等作局部修补,未大规模整修
光绪十五年	1889	最后一次整修
明治二十八年	1895	日军进攻诸罗城,城墙失去防御功能
明治三十九年	1906	嘉义大地震,城垣全数倒塌,仅东门城幸存。日人并不整修,实施市街改正计画后,陆续拆城辟路,东门城楼改设圆环
昭和五年	1930	城垣已拆除殆尽,未留残迹
	2004	嘉义市政府研提“再现诸罗城”计划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参考文献

- [1] 石万寿. 嘉义市史迹专辑[M]. 嘉义:嘉义市政府, 1989.
- [2] 朱景英著. 海东札记[M]. 台北:台湾银行, 1958.
- [3]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台案汇录甲集[M], 台北:台湾银行, 1959.
- [4] 周钟瑄. 诸罗县志[M], 台北:台湾银行, 1962.
- [5] 吴育臻撰述. 台湾地名辞书. 卷二十. 嘉义市[M], 南投:台湾省文献会, 1996.
- [6] 邱上嘉. “嘉义市环境景观总顾问计划”第二季工作报告书[M], 嘉义:嘉义市政府, 2004.
- [7] 和珮等奉敕撰. 大清一统志[M], 台北:文献出版社, 1969.
- [8] 周凯. 内自讼斋文选[M]. 台北:台湾银行, 1960.
- [9] 许佩贤译. 攻台战纪:日清战史·台湾篇[M], 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5.
- [10] 刘良璧. 重修福建台湾府志[M], 台北:台湾银行, 1961.
- [11] 蔡俊尧. 日治时期嘉义市区改正计画与公共建设[D], 台北: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4.
- [12] 萧百兴. 前进于蛮荒的远望、监控与宣示及其流演:清代嘉义筑城的空间意义初探[C], 嘉义研究, 社会、文化专辑. 嘉义县:嘉义县政府、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 2008. 87—184.